

書名：《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

作者：陸胤

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6月

頁數：544頁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間，海內外中國人文學術最重要的變化之一，莫過於對歷史決定論的反思與揚棄。在史學領域，無論是革命史觀、現代化史觀，還是民族國家史觀，都遭遇研究者不斷的質疑。“倒放電影”的研究模式雖然不可能消失殆盡，但早已不再不言自明。在文學領域，不少學者紛紛嘗試跳脫移植自西歐的現代“文學”觀念，依據本土脈絡重探中國“文”的傳統，古代與近代文學（因其時不存在當今意義上的“文學”）研究者尤其致力於此。然而畢竟知易行難，學人若要掙脫後見之明的局限，不僅需要持久的浸淫，更仰賴持續的思辨。陸胤的新著《國文的創生》正是上述思路的成功實踐。概言之，這是一部憑藉明辨慎思，跳出歷史決定論，辨析“國文”概念及其教育實踐如何被發明、被創生的著作。選取“國文”這一稍顯過時的術語——而非當下常用的“語文”“中文”——作為關鍵詞，已經顯示了作者重回清末歷史文化語境的旨趣；使用“創生”一詞，則見證了祛除本質化理解、再現“國文”教育生成的多元路徑的用心。作者心心念念的是“文”的傳統在轉型時代的遭際與命運，因而《國文的創生》可謂踐行了真正意義上的近代“文”學研究，從當下學科分類的眼光來看，則兼具文學史及文化史的意涵。

作者開宗明義，圍繞輿論、學制、教材以及教學法等面嚮展開論述，達成研究目標。若進一步辨析，主體八章分別側重教育改革論述、蒙學讀本、學制綱領、文法書、古文選本、古詩選本、尺牘教本、教學法論述等資料，取材宏富，考辨深微。上述議題早受到教育學者、出版史家、文學史家廣泛而持久的關注，《國文的創生》之所以能夠後出轉精，與作者對於新資料持續而廣泛的搜求息息相

關。譬如論述癸卯學制一章,作者就及時注意到新近影印出版的學制稿本,爬梳修訂與刪改的軌跡,斟酌出張之洞等主事者對於“中國文辭”的審慎思考。又如關於清末教科書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作者在此基礎上廣蒐博覽,考鏡源流,進一步探蹟手抄本、木刻本等被人忽視的出版型態,描畫出新教育下沉到民間的軌跡。不過,在我看來,除卻新資料的發掘與梳理,貫穿全書的動態、辯證的研究思路也是達成研究目標的堅實保障,此外,書中的史觀同樣值得學界同人參考。接下來,就其犖犖大者,稍作評述。

一、國家與士人/知識分子的互動

衆所周知,清末引進或生發的諸多新思潮——如民族主義、社會進化論等——皆是國族危機下的產物。應對危機的主體,既有在野的士人,也有朝堂上的臣僚,既有趨新的知識分子,也有保守的名士。史學界與文學界以往受到革命史觀與現代化史觀的限制,對於趨新勢力的重視遠遠超過守舊勢力,清廷更是被視作鐵板一塊的腐朽集團。近年,學者才注重發掘那些被“消聲”的群體。作者的第一部專著《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就是這一學術趨向的展現,著重突出晚清督撫對於學術“自上而下”的深遠影響。《國文的創生》繼承並拓展了這一視角,藉助“國文”教育這一議題,將在朝與在野的雙方均納入研究範疇。

大體說來,前三章描繪了“國文”從民間到廟堂的興起過程。作者將甲午戰敗標記為關鍵時刻,將戰後趨新士人聚焦於“文字難易”“教法新舊”的語文變革論與蒙學改革論視作一系列變革的起點。在視文教普及為拯救國族危機之關鍵的新思路之下,“國文”的興起也水到渠成。承接這一潮流,戊戌年間的趨新士人創辦新式學堂、譯介新學制、編寫新課本,其中尤以變法派士人編寫的《蒙學報》最富前瞻性,開創了後來國文教科書的雛形,並探索出一種“普通國文”的書寫風格。雖然遭遇變法失敗的頓挫,士人的改革訴求於清末新政時期得到政權的回應:壬寅學制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上述維新士人的蒙學實踐,將推行新教育定為國策,隨後正式頒佈的癸卯學制雖然重心稍作調整,但是基本

目標一致，“國文”依靠國家權力得到制度性保障。

相對而言，後五章注重刻畫“國文”如何由廟堂的理念轉化為民間的實踐，在各個層面落到實處。一方面，作為“小政府”的清廷制定大政方針，但是並沒有左右全局的能力，無論廣設新式學堂、編纂教科書，還是引入新教學法，都廣泛依賴了民間力量。另一方面，朝廷的政策綱領自有其權威，民間開展“國文”教育，士人思考“國文”內涵，都不能不與之周旋。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因應新教育綱領編定的古詩選本。癸卯學制規劃雖然納入“中國文辭”，但是古詩僅僅因其詩教功能與理學傳統附予的蒙學意義，得以在新教育體系中叨陪末座，成為倫理修身課程的一部分。因此，新學制底下產生的古詩選本受國家政策的引導，大多輕忽聲律屬對技巧，將古詩歌視作教化工具。即使如黃節一般的詩人，編寫詩教材時受時風影響，也不能不循規蹈矩，只能在其他著作中暢論心跡。

由於引入國家、士人等不同主體，書中呈現的“國文”創生過程極為生動。兩造之間既有對話，又有合作，既有衝突，又有磨合。換言之，“國文”的概念與實踐是在清末官方與民間的合力之下產生的。除此之外，書中稍稍觸及的家族、地域與國家的互動，如江南經學世家與廣東鄉間開蒙讀書的層次差異等問題，也值得注意，只是作者的研究目標志不在此。作為讀者，我們不免追問，既然清代家學興盛，學術的地域特徵又頗為鮮明，那麼，在“國文”教育推進的過程中，文學世家或者經學世家如何應對？地域之學又如何自處？若結合《國文的創生》的研究思路與關於家族與地域的研究成果，¹應該會引發更多深入而有趣的討論。

二、跨文化移植與誤讀

正如“國文”一詞移植自日本一樣，“國文”的創生很大程度上也是域外資

1 如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徐雁平：《清代世家與文學傳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徐佳貴：《鄉國之際：晚清温州府士人與地方知識轉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

源啟發與刺激的產物。作者的關注點之一為“歐西”資源——其實往往是在華傳教士的翻譯與論著。以第一章為例，作者追根溯源，指出清末知識分子推動語言變革的重要理據——漢字繁難造成識字率低下，又無法接引高深的西學——其實出自花之安等傳教士的觀點。此一思路先為具有教會背景的士人所接受，隨後藉助梁啟超的筆墨廣為流傳，在甲午之後舉國檢討中國文化的語境中，迅速躍升為不刊之論。又如第八章探討教學法變革，作者吸收歐美閱讀史的豐富成果，論證清末國文課堂歷經了從“誦讀”到“講授”的轉型（當然作者強調這一轉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頓挫式發展）。在分析背後的推動力時，作者同樣溯源至傳教士對於中國私塾教學模式的觀察和批評，學童各自為政的吟哦朗誦被視作毫無章法、一團混亂的表現。與此同時，作者發現教會人士翻譯的教育學著作為士人提供了更具體系性的理論資源，其中就包括斯賓塞攻擊古典學教養的功利主義教育論。正是依託上述思路，梁啟超發展出“悟性”先於“記性”的觀點，並催生出中學重“記”，西學重“悟”的“常識”。作者並不止步於此，進而藉助歐美閱讀史研究指出，其實歐洲近代教育也經歷類似的變革過程，傳教士與斯賓塞的言論正是近代學人攻擊古典——尤其是拉丁文法學習——的產物。就此而言，清末的讀書革命某種程度上可謂歐洲文教領域裏“古今之爭”的折射，作者從而描繪出一幅更為宏闊的中西對照的歷史圖景。

書中論述清末士人接受日本影響時，對於跨文化資源的辨析同樣細膩。明治維新持續四十餘年，文教政策經歷了劇烈變革，甚至超越歐西。加上日本本身要處理和文、漢文、西文三種傳統，其間的取捨、興替尤為複雜。以此為參照，作者特別突出晚清不同類型的主體各取所需，於不同時期各有側重，在明治日本的諸多思路和資源中選取最為契合的參照對象，從而摸索出別樣的發展路徑。以第三章論述的學制擊劃為例，壬寅學制更為突出實用主義思路，相對忽略本國文辭，其基本架構也就更多參考明治三十三年以前較為西化的舊學制。隨後制定並頒布實施的癸卯學制則更為注重“中國文辭”，因而選擇性接受了明治後期國粹思潮興起之後突出國文（當然指的是日文）教育的思路，以明治三十三年新制國語國文科為模範。再如第四章論述文法書的興起，也與日本資源息息相關。明治日本轉化歐西學術，又結合漢文資源，形成重技巧

的“修辭學”與重美感的“美辭學”兩種傳統。清末士人將兩種思路同時引入，往往藉重“東文”的權威，重新激活被日人化用的中國文章學要素。作者的上述實踐提醒我們，若要深耕清末思想文化史，對於明治日本的理解就不能淺嘗輒止。唯有同步把握近代日本思想文化的發展進程，才能清晰地辨別中日近代史上迂迴曲折的影響關係。

三、傳統的挪用與轉化

“國文”雖然是新起的概念，但是畢竟根植於傳統學問。尤其是蒙學與詞章之學，可謂“國文”的基礎性資源。由於“國文”提倡者的學術背景、動機頗有差異，與上述傳統的對話也異彩紛呈。

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為代表的蒙學教育在中國綿延千年，根深蒂固，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也衍生出多種思路，從而成為清末士人論述教育改革的最直接參照。梁啟超在戊戌年間提出的幼學論，批評傳統蒙學只重經訓誦讀，不重講授，忽略識字作文，事實上是將為科舉鋪路的“俗學”思路誇大為蒙學之全體。作者指出，這固然受到傳教士言論的影響，其理路實際上又參考了清代《文字蒙求》等著作突出識字的訓蒙論述。與之類似，維新士人編輯《蒙學報》的實踐也援引了傳統資源：在書籍形態上，這一類新型蒙學讀本恢復了傳統雜字書文圖對照的模式；在課文選擇上，讀本編者於《伊索寓言》、西洋史地及科學知識之外，也納入《二十四孝》《日記故事》等傳統蒙書記載的嘉言懿行。再如前文提及的清末古詩選本，雖然學制綱領忽略作詩技巧的傳授，但是依然有《小學堂詩歌》之類教科書在試律詩廢止後，堅持詩學本位，足見蒙學詩教傳統在“有益風化”之外，亦含有“開發性靈”的面嚮。

書中論述詞章之學時，最為看重古文。古文傳統雖然不若蒙學久遠，但是大盛於清代，且依託科舉傳統與書院教育而影響深廣，因而在國文教育醞釀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在作者看來，古文極具靈活性，既可導向科場文字與報章文字，又足以導引西學。就“國文”的定位而言，參與討論的古文家如吳汝綸、吳闈生父子反對“語言工具論”的思路，將“文”視作國族認同的基礎。他們

對突出文章實用性(作者稱之為“理勝”)的諸多學制草案提出批評,提出“辭勝”的主張,將詩文之學視作經史之學的替代,以延續國族文明的命脈。在“國文”教學的實踐中,由於《奏定中學堂章程》確立“講讀古文”的要求,古文家得以在新式中學堂扮演活躍角色,《古文辭類纂》等影響深遠的選本也不斷被採用。這一時期湧現的國文讀本、文學講義因此繼承發展了宋元以來古文選本的文章分類,將“論說”“記敘”兩門擴充為“說理”“敘事”“抒情”三類,流風餘韻甚至一直延續至今日的語文教學中,足見千年文脈傳承與轉化的軌跡。

細繹作者的論述,我們會發現晚清人抱持兩種對立的思路:以吳汝綸為代表的古文家認為“文”關乎文明的承續,故將其視作中國文化之精華;趨新士人則將語言文字視為工具,可以拋棄或改易。後來的歷史進程顯然選擇了後者,將“文”與“道”割裂,以“文”為“器”。上述二元論,開啟了五四時期的漢字拉丁化運動、全盤西化論。作者指出這一思路與西歐功利主義同構,不過令人好奇的是,清末的“語言工具論”是否也有傳統的淵源?² 其間的糾纏與流變,還有待學界同人進一步解答。

總的說來,本書是清末文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從“文”的角度著眼,全書著重呈現近代轉型時期“文”學變革的獨特軌跡:近代“國文”的創生關乎域外資源的引介,從而脫離了古代文學的自足狀態;“國文”又脫胎自古典文章的傳統,與經受“純文學”概念洗禮的現代文學拉開距離。從“史”的角度審視,作者與文學史、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等諸多領域的研究細密對話,將“國文”的創生還原為不同觀念與不同實踐之間的多元對話,再現了立體而生動的歷史場景。換言之,“國文”教育並非從理念到實踐、從起點到終點的平滑過渡,而是一個充滿頓挫、屈折的歷史進程。

與此同時,本書又是一本富有現實關懷之作。雖然語言變革論、漢字拉丁化的聲浪已經消聲匿跡,但是誦讀與講授之爭、古文/文言文教育的位置與功能、乃至中文與英文教學的配合,在今日兩岸三地的教育政策中,依然是時時

2 王東傑在論述國語運動時,曾論及背後滲透的傳統思路。《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湧動的議題。歷史充滿了偶然，決策者一念之間，文化走向也隨之轉捩；但是個體的堅持或者妥協，同樣影響文化的進路。身處現代教育體制中的讀者，披覽之餘，能不深長思之？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 崔文東）